

## 第五章 結 論

本文的目的在於瞭解台灣選民投票與選舉參與的情形及其影響因素，包括選民的社會系絡、社會背景，以及社會心理因素；透過交叉分析、變異數分析、T 檢定、相關分析等統計方法來探討各變數之間的關係，與個別變數對選民投票參與及選舉參與的影響。以下為本文研究發現之說明，接著針對本文之研究過程進行檢討，並提出建議，以供讀者及後續研究參考。

### 第一節 研究發現

本研究以選民個體為分析單位，於分析資料中加入總體變數，可以觀察到總體變數對選民投票及選舉參與行為的影響。

#### 一 台灣選民投票參與及選舉參與情形

台灣地區選民的投票率向來都維持在六成以上，不過幾乎年年舉辦選舉，有時候同一個年度舉辦不只一種選舉，如民國九十三年三月份選舉第十一屆總統、副總統，十二月選舉第六屆立法委員；加上歷次選舉過程中日益普遍的黑函與口水戰等情形，漸漸降低了選民對政治事務的關注，也降低了選民的投票意願，造成了近年來的投票率出現了些微下降的情形。如在民國八十年之後，立法委員選舉投票率從七成降至六成，在民國九十三年十二月第六屆立委選舉中，投票率僅 59.2%。

台灣選民在參與選舉活動方面，選民參與比例最高的是閱讀選舉公報、政黨或候選人傳單，其次為和他人討論選舉，再其次為親自前往聆聽政見會或辯論會；而會向親友拉票、參加政黨或候選人舉辦之餐會、為政黨或候選人助選、捐款等競選活動的選民皆不到一成。

從比較的觀點來看，台灣選民的選舉參與情形與其它民主國家相近，選民參與比例較高的往往是閱讀選舉公報或討論選舉等個人性活動，多屬旁觀性質，因為參與這些活動不需要強烈動機或專業能力，成本比較低；相對地，實際參與政治集會、為政黨工作、捐款等活動，則需要較強的動機與能力，表示

選民必須負擔較高的參與成本。換句話說，愈個人式的參與方式，選民的參與程度愈高，當選舉活動需要與他人接觸、或需要負擔更高成本時，選民的參與意願及實際參與程度就比較有限。

## 二 台灣選民投票參與及選舉參與的影響因素

台灣地區選民在選舉期間被動員的情形相當廣泛，僅二成的選民未被動員，其餘八成的選民都曾經被各式各樣的動員方式接觸；而選民被動員的方式，主要是透過電話語音或政治人物進行，透過同儕團體成員動員的比例則是最低的，被親友或地方菁英動員的選民比例則是介於兩者之間。

人際互動較為頻繁的選民，大部分擁有中等以上的教育程度，以及積極的政治態度，年長的選民參與社團活動的頻率比較高，中壯年選民則是政治動員最主要的對象，而且頻繁參與社團活動的選民會被政治動員的程度也是最高的，因為他們將自己暴露於較多的人際接觸場合，自然有比較多被動員的機會。簡單地說，被動員的對象，多是具有成為人際網絡中心潛力的選民，他們與其他人的互動頻繁，往往在團體中扮演意見領袖的角色，因此有助於降低政治菁英的競選成本，並傳播、塑造有利於他們當選的環境氣氛。

環境系絡也會影響選民個人的人際網絡，政黨的競爭程度反映了一地的政治氛圍，在政黨競爭較激烈的選舉區中，選民被動員的程度反而比較低，因為政黨或候選人面對較高的變動性，加上發動動員的人事成本較高，所以政治動員並不會隨著政黨競爭激烈程度增加而增加。在競爭程度較低的選舉區中，以政治菁英與地方菁英為動員選民的主要管道，雖然沒有直接證據顯示，但是我們認為在這些選舉區中，可能有特定政黨或候選人掌握相當的政治實力，較能確保政治動員的效果，所以動員程度比較高。

一地的農業從業人口比例，可使我們瞭解該地區的經濟發展。在中等農業人口比例地區中，選民被動員的程度比較高，因為選民的異質性較高，政黨或候選人較難掌握訴求的對象或潛在支持者，所以採取比較多元的動員方式，與較高程度的政治動員。在農業人口比例比較高的地區中，即都市化程度較低的

地區，選民較多是低教育程度、缺乏資訊來源，比較容易受到政治菁英與地方菁英的動員。

人際網絡對選民的投票及選舉參與的影響方面，政治動員與參與社團頻率表示選民與其他選民接觸的經驗，人際互動增加的時候，表示選民可以透過互動得到的政治訊息更多，也接受到更多伴隨訊息而來的期望；豐富的政治訊息降低了選民的參與成本，人際期望則增加了選民參與所可能得到的回報。因此，政治動員與選民的人際網絡有助於提升選民的投票參與及選舉參與程度。

在環境系絡方面，政黨競爭程度與投票及選舉參與雖然沒有顯示直接的關係，但是控制政黨競爭程度後，可以發現選民被動員程度與其投票參與之間原本就存在的正向關係，會隨著政黨競爭程度的增加而更為明顯，表示政黨競爭程度的確強化了政治動員與投票參與的關係。

農業人口比例與選民的投票參與之間存在正向關係，但是與選民選舉參與之間則存在負向關係；因為投票是一種比較初級、比較簡單、個人式的政治參與方式，選民可以在缺乏充分政治訊息的前提下完成，在這種情形下，選民尤其容易受到政治動員的影響。農業人口比例愈高的地區，表示有較少人口擁有高教育程度、豐富的資訊來源、參與管道等條件，而參與選舉活動需要比較強的動機、負擔比較高的成本；因此農業人口比例愈高的地區，選民的選舉參與程度愈低，相對地，農業人口比例愈低的地區有愈多符合上述條件的人口，所以選民的選舉參與程度就愈高。

年齡與投票參與及選舉參與呈現∩型曲線，即曲線中間出現高峰，表示中壯年選民的參與程度最高，曲線兩端下垂表示青年與年長選民的參與程度比較低。年長選民的投票參與比例比青年選民高，但青年選民的選舉參與程度則比年長選民高。這是因為投票是比較獨立的、個人式的參與方式，選民只要在投票日當天到投票所投票就可以，需要負擔的成本比較低，對經驗豐富的年長選民而言，也許只是一種習慣。參與選舉活動則有較多人際接觸的機會，青年選民雖然政治經驗不多，態度卻比較積極，行動力比較高，因此選舉參與程度比

較高。

30 歲至 59 歲的中壯年選民投票參與及選舉參與程度最高，當選民的年齡被控制時，40 至 49 歲選民的投票參與並不會受被動員頻率的影響，但是其選舉參與則會。因為 40 至 49 歲選民本來就是與社會連結比較緊密、對政治事務比較關注的一群選民，所以不論是否被動員，他們多傾向會去投票；但是參與選舉活動需要負擔較高的成本，因此政治動員能夠幫助他們降低參與的成本，此時，被動員頻率就有鼓勵參與的作用。

教育程度與投票參與之間呈現負向關係，與選舉參與之間則存在正向關係，這也說明了投票是比較簡單的政治活動，尤其國中以下及專科的選民，其投票參與較容易受親友鄰居動員影響。參與選舉活動的成本較高，選民需要有金錢、時間、能力等條件，才能負擔，因此當選民缺乏這些條件時，會傾向不參與，或僅採取低程度的參與；高教育程度選民較符合上述條件，其蒐集、組織政治訊息的能力較佳，能負擔較高的參與成本，因此選舉參與程度較高。

政治態度積極的選民，會積極參與投票與選舉活動，他們的選舉參與程度比較高。選民的政黨認同強度愈強，自主性愈高，愈不容易受政治動員影響；政治興趣低的選民，對政治事務關切的程度很低，所以不容易受政治動員影響；政治興趣高的選民，自主性比較高，對政治事務有自己的看法，其投票參與及選舉參與也不容易受政治動員影響。政治興趣中等的選民，對政治事務有相當程度的關切，自主性又不會太高，其投票參與及選舉參與比較容易受政治動員影響。

選民的社會系絡、社會背景，及社會心理因素，都會影響到選民在投票參與及選舉參與方面的表現，尤其是人際網絡較為活潑的選民，其參與程度會比較高。政治環境較具刺激性及經濟發展程度較低的地區，也對選民的參與行為有重要的影響，處於不同環境的選民，他們的人際網絡型態、人際網絡與投票參與及選舉參與的關係也會有所不同，當環境中的刺激比較強烈時，選民的參與程度就會比較高，或者環境中有較多便於選民蒐集政治資訊的管道，選民的

參與程度也會比較高；可見社會系絡對選民的投票與選舉參與行為影響之廣泛。

## 第二節 檢討與建議

本文透過交叉分析、變異數分析、T 檢定及相關分析等統計方法，呈現重要的個體與總體因素與選民投票及選舉參與行為的關係；誠如學者所說，研究選民的投票及選舉參與行為時，不應偏廢個體層次或總體層次的分析(雷飛龍、陳義彥等，1989：31；謝雲嬌，1995：114；張世昌，1997：112)，研究發現也證實了環境變數會透過其它中介變數，影響選民的參與行為，如選民的人際網絡。然而，囿於某些主客觀條件的限制，致使本研究未臻完備，以下針對其中可能的缺失進行檢討，並提出說明與建議，以供讀者及後續研究參考。

### 一 總體資料的限制

在地區經濟發展的指標方面，由於民國八十八年之後，中央並沒有再次統一進行農業人口的普查，因此只有新竹市與台中縣各鄉鎮市區的農業人口比例為民國九十年資料，其它縣市均為民國八十八年資料。換句話說，這些資料可能未能如實反應民國九十年第五屆立委選舉時，各地區的經濟環境條件。

### 二 個體資料的限制

在民意調查訪問中，受訪者的不實回報可能會影響研究者的估計。當受訪者被問及是否在投票日當天前往投票時，由於「政治參與」是民主政治重要的表徵之一，因此選民即使沒有去投票，也會傾向回答「有去投票」，造成過度表態 (over-report)，如實際上在投票日當天的投票率僅六成六，本研究所使用的民意調查資料顯示，在被抽出有代表性的 2022 個樣本中，有八成的受訪者有去投票，與實際投票率出現二成的落差。在詢問受訪者是否實際參與競選活動時，受訪者則可能為了避免繼續被問及敏感問題，如參加誰的造勢活動，而傾向回答「沒有參加」，或不願意表態，造成低度表態 (under-report)。以上兩種情形都有可能影響研究者的分析，造成估計或推論上的誤差，使得理論上重要的變數，與依變數之間沒有任何關聯。

### 三 社會系絡研究的延伸

本文證實了總體環境會透過人際網絡的中介作用，對系絡成員的參與行為產生不同的影響。那麼，接下來我們要思考的問題是：被成功動員的選民，在什麼樣的環境之下選擇被說服？為什麼被說服？又選民如何成功地認知環境中的政治刺激？在選民的人際網絡方面，不同型態的社會團體，對其成員的影響有無不同？如何不同？選民對社會團體的認知如何被塑造？什麼因素使選民敏感或不敏感地認知被傳遞的政治訊息？在政治動員方面，政黨如何透過政治動員來降低選民的參與成本，或提高選民的參與報酬？這些關於社會系絡與選民政治參與的問題，可以透過質化研究方法，如深入訪談、焦點團體等，來進一步描述與闡釋。

#### 四 跨時間的研究

台灣施行政治民主化行之有年，歷經解嚴、終止動員戡亂、國會改選、總統直選、政黨輪替以及多次修憲，使得各政黨勢力互有消長變化，台灣選民所處的政治環境一直處於變動的狀態，經濟發展、社會變遷也或多或少改變了選民的參與習慣，上述種種改變必定會影響選民在政治事務方面的參與。因此建議後續研究能夠針對不同選舉別，進行跨時間的投票及選舉參與研究，以瞭解台灣選民的參與如何隨著時間變化、重要變數對選民投票及選舉參與的影響為何，及變數影響力的跨時間變化，相信對台灣選民的投票參與及選舉參與會有更全面性的瞭解。